

珍藏卡帕

ROBERT CAPA

[美] 理查德·惠兰 著
陈立群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卡帕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珍藏卡帕: 罗伯特·卡帕终极收藏 / (美) 惠兰
(Whelan, R.) 著; 陈立群译.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
社, 2011.5
ISBN 978-7-80236-557-5

I. ①珍… II. ①惠… ②陈… III. ①摄影集—美国
—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93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1-1433号

原书名: 罗伯特·卡帕©2001 费顿出版社
中文版由费顿出版社授权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本书内容中的任何一部分在得到费顿出版社书面许可之前,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 以传统的或电子的方式, 进行翻印、拷贝、编印、复制、
储存和传播。

Original title: Robert Capa © 2001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of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前言插图照片作者: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第11页左上, 第13页下; 米歇尔·德康: 第14页左上; 卡尔·古德温: 第10页左上、下; 理查德·格拉夫: 第10页右; 菲利普·哈斯曼: 第12页
右上; 安德烈·柯特兹: 第6页; 戴维·舍尔曼: 第9页左上; 弗雷德·斯泰恩: 第7页左

书 名: 珍藏卡帕
作 者: [美]理查德·惠兰
译 者: 陈立群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高 扬 黎旭欢
装帧设计: 衣 钊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 邮编: 100005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book.com

邮箱: office@cpphbook.com

印 刷: 勤达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开 本: 12

版 次: 2011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80236-557-5

定 价: 3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珍藏卡帕

ROBERT CAPA

[美] 理查德·惠兰 著
陈立群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关于摄影师

1990年至1992年间，我和理查德·惠兰重新检视了罗伯特·卡帕所有的照片小样。从我哥哥一生中拍摄的大约70000张底片中，我们挑选了933张最佳作品，以对他的整个创作生涯（1932—1954年）做一次深度回顾，当然这里并不包括他所有的佳作。本书中的照片以年代为序，按专题编排，细致地回溯了他的人生轨迹。933张作品中，几乎一半作品都从未被广泛发表或展出过。我们的宗旨是挑选出那些富有强烈感情和视觉冲击力的经典作品，然而，为了更完整地叙述故事，我们也挑选了少数视觉力量较弱、难以独立叙事的照片入册。

康奈尔·卡帕

Cornell Capa

《珍藏卡帕》 理查德·惠兰 著

罗伯特·卡帕并非生来就要做一个战地摄影师，是时代与环境无情地将他推上了人生的每一级台阶。

1913年10月22日，安德烈·弗里德曼在布达佩斯出生，这是卡帕一生所用的多个名字中的第一个。他来自一个非传统的犹太家庭，卡帕的父母——德热和尤利娅·弗里德曼，拥有一间时髦的制衣

罗伯特·卡帕的工作照，于1938年12月3日刊登在《图画邮报》。当期还登载了由他拍摄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图片。

PICTURE POST

Vol. 1. No. 10.

December 3, 1938



The Greatest War-Photographer in the World: Robert Capa

In the following pages you see a series of pictures of the Spanish War. Regular readers of "Picture Post" know that we do not lightly praise the work we publish. We present these pictures as simply the finest pictures of front-line action ever taken. They are the work of Robert Capa. Capa is a Hungarian by birth; but, being small and dark, he is often taken for a Spaniard. He likes working in Spain better th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He is a passionate democrat, and he lives to take photographs. Over a year ago, Capa's wife, on her way back to join her husband in Paris, was killed in Spain. She was standing on the running-board of a car when it collided with a tank. Capa went to China and took pictures of the Chinese war, some of which we have already published. To-day, Capa is back in Spain, taking pictures for "Picture Post."

PICTURE POST

沙龙。与有着极强意志力和拼命工作的母亲相比，卡帕的父亲处事淡漠，但泼辣精干、无忧无虑，甚至有些不太负责任，时常因为在外打牌而擅自离岗，可每次都能找到合理的借口搪塞过去。卡帕遗传了父亲善于讲故事的天赋，甚至青出于蓝，也继承了在困难时期也能吃饱吃好的本事。这种本领让他在之后的工作中总能找到看似不可能得到的物资——哪怕是最严酷的战乱之地，这也让他的朋友们颇为惊讶。

拉斯洛，是尤利娅和德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出生于1911年。两年后安德烈出生，从娘胎里出来时他的脖子上缠绕着胎膜。去掉胎膜后，人们发现这孩子有着浓密的黑发，看起来好似几个月大的婴儿。最奇怪的是他有一根多出的小指，这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掉了。他母亲和朋友们将这些不凡事件统统解释为这个孩子长大后将成为名人的征兆。1918年春，弗里德曼家的第三个儿子科尔内利（后改名康奈尔）出生，之后，他也成了一名摄影师。

从小，安德烈较好的相貌和温和的性格就非常引人注目。较深色的皮肤、浓密的黑发和眉毛、乌黑的大眼睛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吉普赛人。童年时，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班迪”，这个名字他一直用到20岁出头，及其职业生涯的初期。

少年时的班迪性格外向、独立，富有冒险精神。滑雪时常常很大胆，这让他的母亲非常担心。朋友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伙伴、让人开怀的故事大王。但班迪也有较为严肃的一面，他酷爱阅读，很早就开始对社会事务和政治改革感兴趣。他的导师，诗人和画家洛约什·考沙克，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和前卫艺术团体事业的领袖。在这个团体的杂志刊登的照片中，包括美国改革家和摄影家雅各布·里斯和路易斯·W·海因的作品，它们有力而深情地展现了移民、贫困和童工的生活。从卡帕后来拍摄的有关难民、废墟中的生活和身处战争困境与恐惧中的儿童们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

高中时，年轻的班迪希望能成为一名文字记者，这是一个可以让他把对政治和文学的热爱结合起来的职业。对布达佩斯聪明的年轻人来说，新闻看起来是个有前途的行业。那时，这个城市里有12种晨报和7种晚报。然而，即便天资聪颖，班迪在匈牙利上大学的希望也不是很大，因为法西斯式的反犹太主义独裁统治严格限制犹



1910年，布达佩斯。卡帕的父母德热和尤利娅·弗里德曼。

太学生入学。

班迪十几岁时就经常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抗议匈牙利压迫式统治，以此表达他在政治上的不满。1931年晚春的一天，他和一名共产党人交谈了许久。虽然班迪最后没有加入共产党，但还是被秘密警察盯上了，半夜在自家公寓里被拘捕。经过警察局长的周旋——局长的太太是制衣沙龙的常客，班迪第二天获释，条件是在几周內离开匈牙利。虽然只有17岁，年轻的罗伯特·卡帕却已成了

政治流亡者。

1931年7月，班迪·弗里德曼前往柏林，就读于德国政治学院，主修新闻学。那年末，他得知父母的生意因“大萧条”而受到严重影响，无法继续寄钱给他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班迪于是想办法在德夫特摄影社找了一份外勤员和暗室助手的工作。德夫特是柏林一所很有影响力的图片社，代理诸如安博、费利克斯·曼和沃尔特·鲍斯哈德等杰出摄影家的照片。图片社的老板西蒙·古特曼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的才干，借给了他一台相机，并开始派他去采访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新闻。1932年12月班迪接到了他的第一个大任务，古特曼派他去哥本哈根拍摄流亡的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给丹麦学生演讲的事件。班迪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同情托洛茨基，而后者曾强烈反对斯大林领导前苏联的方向。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作为左派的犹太人班迪很快就逃离了。他首先到了维也纳，然后得到了返回布达佩斯的许可。在家度过了一个夏季，并在当地接受了一些摄影任务后，于9月去了巴黎，他希望能在巴黎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取得成功。然而，刚开始时，他面对的却是穷困、饥饿和仇外情绪，只有在蒙帕纳斯地区那些由德国、匈牙利和东欧的难民组成的艺术家团体中，同志情谊才得以让这些问题的缓解。在无法得到任何拍摄任务的条件下，班迪只能靠智慧生存。

下，班迪只能靠智慧生存。

大概是在1934年春，班迪遇到了安德烈·柯特兹，一位年近40，享有盛名的匈牙利摄影家。他拍摄的巴黎算命人或苦修派修道院生活类的专题报道经常出现在法国《视》（《Vu》）杂志上，这也是《生活》杂志的几大先驱之一。柯特兹和妻子伊丽莎白收养了班迪。柯特兹借给他一小笔钱，帮他找工作，还教他拍照。这两位热心而敏感的男人惺惺相惜，以巨大的关爱和深切的同情心看待着同时代的芸芸众生。

柯特兹是率先探索在艺术和新闻摄影中使用35毫米徕卡相机的领头人之一，那时这款徕卡相机还因为又小又不显眼而一直被视为玩具。这款相机在一战爆发前已经发明，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在市场上。在柯特兹的指引下，卡帕拿起了徕卡，并意识到它作为纪实报道的工具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潜力。它让他能够混迹于巴黎人民阵线游行的人群中，并且可以抓拍照片，这是那些无论到哪里都拖着醒目的格拉菲相机的摄影师们无法做到的。后来，卡帕怀抱他的这一探索又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走向了战场。

到巴黎后不久，班迪（这时候他开始叫自己安德烈）与两位同龄的摄影师成为朋友，一个名叫大卫·史慈民，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有宫廷血统的波兰难民，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的署名为“基姆”；另一个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他出身于经营纱线和纺织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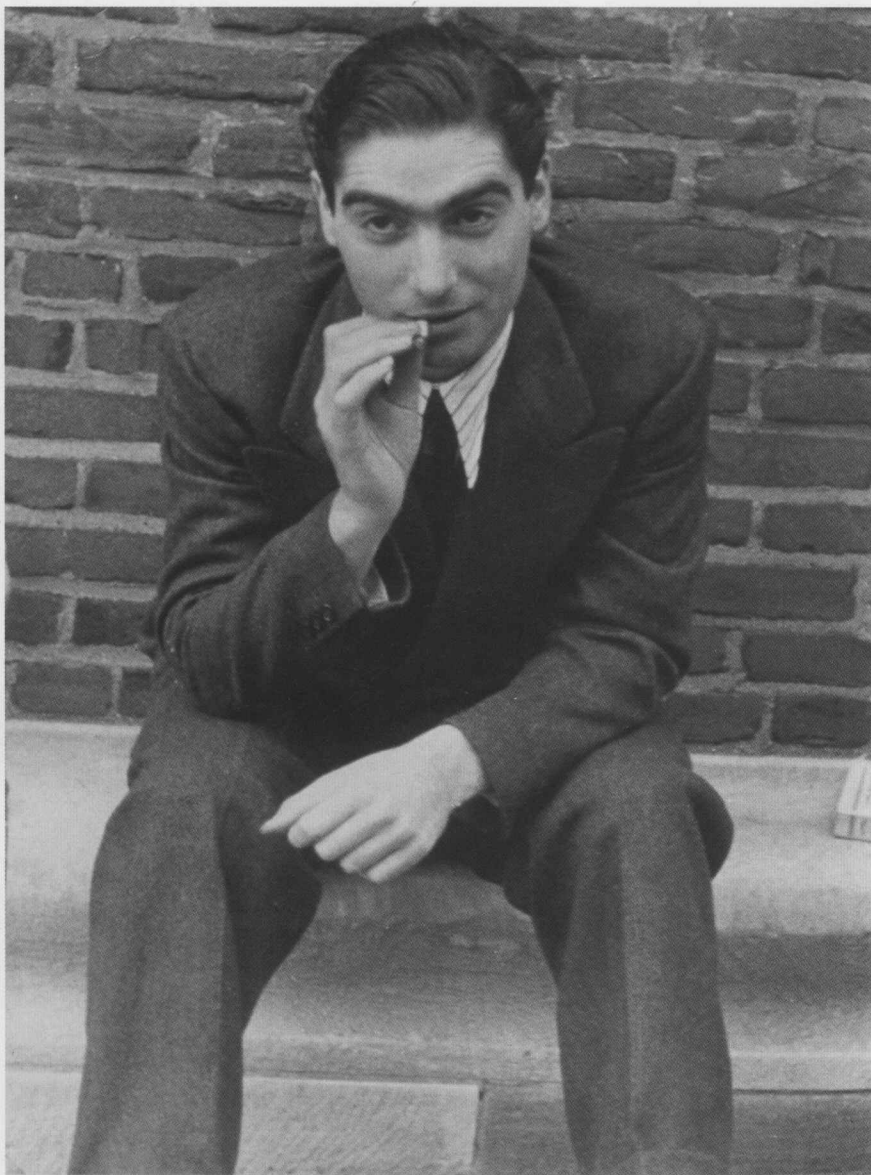
1931年或1932年，卡帕在柏林就读于德国政治学院时使用的学生证。



的富裕的法国家庭。这三个朋友会在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里花几个小时讨论政治和摄影。他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也彼此批判。与他们的导师柯特兹一起，他们跻身摄影革命的领军人物之列，这次革命引入了小相机美学，其要义就是布列松所推崇的“决定性瞬间”。

1934年，安德烈遇到了一个冲劲十足、野心勃勃并颇有历练的德国难民，名叫格尔达·博赫利尔，她于前一年离开了莱比锡老家。格尔达比安德烈大3岁，长相与当红的德国影星伊丽莎白·贝格纳有着惊人的相似。贝格纳当时刚刚移居英国，主演了一部关于俄罗斯凯瑟琳大帝生活的电影，并大获成功。格尔达很快便与安德烈相

1937年，纽约。卡帕。



恋，并成为他事实上的商业经纪人。她劝他改掉了颇为随意的波希米亚装束和发型，让他看起来更加专业。她在事业上鼓励他，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她都仔细地为他的照片配上图片说明。作为一个投入的左派分子，格尔达对安德烈认为摄影可以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想法深表赞同。卡帕则开始教她摄影入门知识，希望能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

1935年春，在前任老板——仍然生活在柏林的西蒙·古特曼——的安排下，安德烈前往西班牙，为德夫特完成几个新闻摄影任务。在这次旅程中，安德烈最为享受的就是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几周时光。在那里，他拍摄了欢快的复活节活动和节前严肃的宗教仪式。然而，除了类似一阵风式的西班牙之行之外，安德烈还是不能成功地销售自己的照片，或说服法国编辑接受让他拍摄专题的想法。（1935年，当他住在巴黎找不到活干的时候，安德烈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一定要进入电影圈，因为我在摄影方面没希望。”）那时，安德烈的法语不是很好，虽然可以用基本的法语对付日常生活，但对编辑们来说，不流利就谈不上专业。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在巴黎还有个较为年长且已经立足的摄影师，名叫乔治·弗里德曼，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因为杂志署名时一般只标注摄影师的姓氏。所以，1936年，安德烈和格尔达决定打造一个名叫“罗伯特·卡帕”的成功美国摄影师。当格尔达去编辑部公关的时候，她会声称安德烈的照片出自卡帕之手——她让编辑们觉得有机会买到这位天才的作品，其实是莫大的荣幸，因为要想得到他的作品很不容易。适时适当地留下好印象之后，编辑们果然纷纷购买了安德烈的照片，并广泛发表。

安德烈可能是从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身上获得灵感，为自己想出这个新的姓氏，该导演曾因拍摄克劳德特·科尔贝特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金发女郎》和《一夜风流》而享誉全球。作为一个立志进入电影圈的年轻人，也许安德烈也希望利用这样一个与好莱坞一线导演如此接近的假名能给他带来好运气。

而罗伯特这个名字也源于电影圈，来自1936年在《茶花女》中主演过葛丽泰·嘉宝银幕情人的罗伯特·泰勒。和卡帕一样，罗伯特这个名字易念、易写、易记。在采访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的新姓氏听起来很有西班牙味道，也很顺耳，尤其是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称



1935年秋，巴黎。卡帕和格尔达·塔罗。

呼他时，简单地将“罗伯特”改为“罗伯托”就可以了。同时，格尔达也为自己取了一个几乎同样具有都会风情的假名。从1936年起她就不再是格尔达·博赫利尔，而是格尔达·塔罗，借自一个在巴黎的年轻日本画家冈本太郎。

很快这个神秘的卡帕真的出名了。当这个把戏快被揭穿的时候，安德烈意识到他必须把名字改成罗伯特·卡帕，才能承担起这份炒作而来的名声。

1936年春天，罗伯特·卡帕在巴黎著名的人民阵线（以社会党人莱昂·布卢姆为首的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体）参加大选前后，拍摄了动荡时期的游行和抗议活动。随着欧洲日益分裂成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对抗冲突逐渐多了起来。尽管前苏联最后还是坚定地表示了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立场，但国际联盟仍然采取了“绥靖政策”，而美国则以中立的孤立主义远离战事。

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最终给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们以武力反抗法西斯的机会。8月，卡帕与格尔达·塔罗前往西班牙采访共和国政府对抗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叛乱。卡帕的照片在法国的报纸和诸如《视》、英国的《每周画报》以及美国的《生活》等杂志上首次发表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媒体的发行量都很大。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公众完全依靠此类出版物获得对时事的视觉信

息——而卡帕的照片却是空前的及时和给力。

在第一次行程中，卡帕和塔罗拍摄了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战役。在安达卢西亚，卡帕拍摄了一名西班牙共和党（保皇派）武装人员被击中的照片，这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之一（第81页），也是卡帕最具争议的照片。它不仅受到了针对拍摄地点的质疑，还有关于其可靠性，即是否摆拍的质疑。

如今，我们知道这张《倒下的士兵》的照片于1936年9月5日在科尔多瓦北部8英里处木里亚诺山拍摄，那是保皇派对科尔多瓦的一

1940年，墨西哥。卡帕。



次失败的进攻行动。我们甚至还弄清了照片中人物的身份，也就是费德里科·博雷尔·加西亚，西班牙政府的档案馆保存了他在木里亚诺山牺牲日期的记录。

《倒下的士兵》这张照片于1936年9月23日在《视》上首次发表，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的另一张显示倒下进一步动作的照片则被登载在同一页的下方。虽然一些文字作者声称两张照片上是同一个人，但仔细考察后发现这无疑是两个人。两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倒下的巧合也许令人费解，但是看起来卡帕当时正处在一个浅战壕里，并且当两个人在冲锋时快速相继倒地时，他一直在那里。我们没有在地上看到前一个人的尸体，很可能是因为战友们已经把尸体拖回了战壕。

不管怎样，西班牙战士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摆出自己被射中的姿势拍照。他们害怕这么做将给他们带来最坏的运气。因此即使摆拍，他们也会摆出胜利的形象。当1937年被问及照片之事时，卡帕回答道：“在西班牙拍照不必要花招。你不用摆布你的相机（或摆布被摄者）。照片就在那儿，你拍就是了。真相就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材料。”

经过所有的争议和推测之后，卡帕《倒下的士兵》的照片仍然成为了所有在战争中倒下的保皇派士兵们的象征，也是西班牙共和国的象征——向着铺天盖地的强权勇猛冲锋，却终于遇难倒下。

1941年或1942年，卡帕跟随一支部队穿越大西洋。



1936年11月初，卡帕前往马德里（这次格尔达·塔罗没有同行）采访，那时法西斯军队正从南部和西部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马德里终于得以保全，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纵队的顽强抵抗。国际纵队是由大批的外国志愿者组成的志愿军。当时，佛朗哥反动军队受到了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资助，许多欧美青年男女因此认为如果能志愿援助政府方面，就有机会抗击法西斯，并给予其沉重的打击，甚至使其在全球消亡。国际纵队曾宣称：“马德里将会是法西斯的坟墓！”他们希望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斗的胜利能够阻止一场看似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然而，这个乐观的愿望最终却破灭了，很大程度源于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武器禁运政策，这在当时主要伤害了政府一方，因为佛朗哥叛军能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

卡帕在马德里停留了一个月，不仅拍摄了城西郊的战斗，也拍摄了受到严重轰炸的中低阶层聚居街区平民们挣扎生存的状况。

（佛朗哥军队的飞行员接到命令不许轰炸富人区，因为富人大多支持法西斯。）法国左派报纸《关注》用了四期报纸刊登卡帕在马德里拍摄的让人震惊的照片。那时候，安德烈·弗里德曼已完成身份转换：他不仅成了罗伯特·卡帕，而且成为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地摄影师。

卡帕相信用他的相机帮助反法西斯事业对他来说是最要紧的任务。他是一名斗士，至少与国际纵队的成员们一样，他有着巨大的责任感，要尽可能地拍摄到最有力量的照片，以此说服世界行动起来，帮助西班牙政府并结束武器禁运。他的许多照片不仅在欧美的杂志上发表，也被印在西班牙政府出版的宣传册上，各种救援组织也纷纷采用。

1937年冬季和春季，卡帕采访了西班牙的几个战场前线，有时候不带格尔达·塔罗。而此时，格尔达也已成长为一名独立的新闻摄影师。他们采访了马拉加撤退、马德里的持续被困、首都西北部塞哥维亚附近山上的战事。卡帕拍摄的关于最后一场战役的照片，以及他对好友欧内斯特·海明威描述的那些人和事，为这位作家完成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提供了许多细节资料。

1937年7月，格尔达·塔罗采访马德里西部布鲁内特的战役。在混乱的撤退中，她被一辆保皇派军队的坦克碾死。法国共产党宣布



1944年6月6日，英格兰朴茨茅斯。卡帕于登陆日夜里。

她为英雄，并在拉雪兹公墓为她举行了盛大葬礼，同时，还邀请伟大的现代主义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为她塑立了纪念碑。本打算与格尔达结婚的卡帕永远也无法从她的去世中完全恢复过来。8月末，他乘船去了纽约看望母亲和弟弟康奈尔，当年他俩都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卡帕和《生活》杂志谈成了协议，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生活》杂志都将定期刊登他的照片。

1938年初，卡帕乘船来到中国，并为约里斯·伊文思工作，拍摄中国抗日的纪录片。卡帕在中国6个月内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在日军轰炸下，临时首都汉口的状况。在他拍摄废墟生活的同时，卡帕不断想起他在马德里见证过的种种场景。1938年9月，就在汉口沦陷前不久，他离开了中国。

1939年9月，欧洲爆发世界大战，法国政府关押了许多被怀疑为同情左派分子的人士。害怕遭遇相同的命运，卡帕乘船去了纽约，在那里他开始为《生活》杂志拍摄各种专题。（在中国时，他掌握了基础的英语，而英语是出版公司的通用语言。）第二年杂志编辑派他去墨西哥，为期数月，拍摄该国的总统选举。

二战期间，虽然美国政府在技术上认定卡帕是“敌人”（因为当时他还是匈牙利公民，而匈牙利与德国结盟），但他仍成为《生活》杂志的随军记者。在拍摄了伦敦人在大空袭期间大无畏的生存状况后，他继续报道了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本土、法国和德国等主要战场前线上的战事。

作为他最著名的一次任务，1944年6月6日，卡帕与美军第一批军队登上了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在其战争回忆录《轻微失焦》中描述此次经历时，卡帕写道：“战地记者有他的本钱——生命，这既在自己手里，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再放回自己的口袋。我是个赌徒，我决定跟随E连加入第一梯队。”

登陆日凌晨3点，卡帕所在的美军海岸警卫运输船上提供了包括热蛋糕、香肠、鸡蛋和咖啡的战前早餐。1小时后，所有人，包括卡帕，悄悄地在主甲板上集合，并在登陆艇上就位。随后，登陆艇被放入汹涌的海里。

卡帕对奥马哈海滩登陆（360—365页）做了如下生动的记录：

“我拍完了照片，海水在我裤腿里冰凉。犹豫着，我想从钢柱旁走开，但子弹每次都把我赶了回来。我前面50码处，一艘烧得半焦的水陆两栖坦克挺出水面，给我提供了下一个藏身之处……在浮尸之间，我游到了它旁边，停下来又拍了几张照片，最后鼓足勇气，一跃到了岸上……”

“海滩的斜坡给了我一些保护，因为我们都平趴着躲避机枪和来福枪子弹，但海潮把我们推向铁丝网上方，铁丝网那边枪声不断……我拿出我的第二台康泰克斯相机，头也不抬地开始拍照。

1945年3月，卡帕准备与盟军的伞兵跳伞渡过莱茵河。





1945年8月，柏林。英格丽·褒曼。

“从空中看，‘小红海’（Easy Red）看起来就像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以一条沙丁鱼的角度拍摄，我照片的前景满是湿靴子和绿色的脸。在靴子和脸之上，则充满了榴霰弹的烟雾；而照片的背景则由烧焦的坦克、沉船构成。”

为了拍摄登陆，卡帕带了三台相机：两台35毫米康泰克斯单反相机，每台都上了一卷36张的黑白胶卷，还有一台装了2¼英寸反转片的禄莱福莱相机。他在运输船和登陆艇向奥

马哈海滩进发时使用禄莱福莱相机，离开登陆艇开始涉水上岸时，换用了第一台康泰克斯，拍完36张后，又换了第二台康泰克斯。一卷胶卷过后，他发现手抖得厉害，没法装新胶卷，于是便退回到水里，上了撤离伤员的医疗登陆艇，然后又用上了禄莱福莱相机。

登陆艇把卡帕带回了运输船上，在那里，他（仍然用他的禄莱福莱相机）拍摄了装在袋子里后放在甲板上的尸体。他想回到海滩

1945年8月，柏林。卡帕和英格丽·褒曼。



上，但因为太累了只能躺下。醒来后船已经回到了英格兰。他将拍过的胶卷交给信使，信使骑着摩托车将它们送到《生活》杂志的伦敦办公室，在那里必须马上冲洗出来，经过审查后，送往纽约以供出版。为了赶上下一期的截稿时间，《生活》杂志暗房的技术员匆忙中把烘干箱的温度调得过高，导致胶卷上的涂层融化。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卡帕冒着生命危险用康泰克斯拍摄的72张底片几乎全部被毁，仅保存了11张；而用禄莱福莱相机拍摄的反转片并未受到损伤。

当那些现已家喻户晓的美军登陆诺曼底的照片发表后，《生活》杂志称那是因为摄影师的手抖而造成“轻微失焦”。于是，这几个字为卡帕的战争回忆录提供了一个略带嘲弄意味的标题。

1944年8月25日，卡帕随着解放法国的装甲师进入了巴黎，这是他曾经的家园。在《轻微失焦》里，他写道：

“通向巴黎的道路是敞开的，每一个巴黎人都到街上来抚摸第一辆坦克，亲吻第一个人，来唱歌，来哭喊。从来没在早晨见过这么多人如此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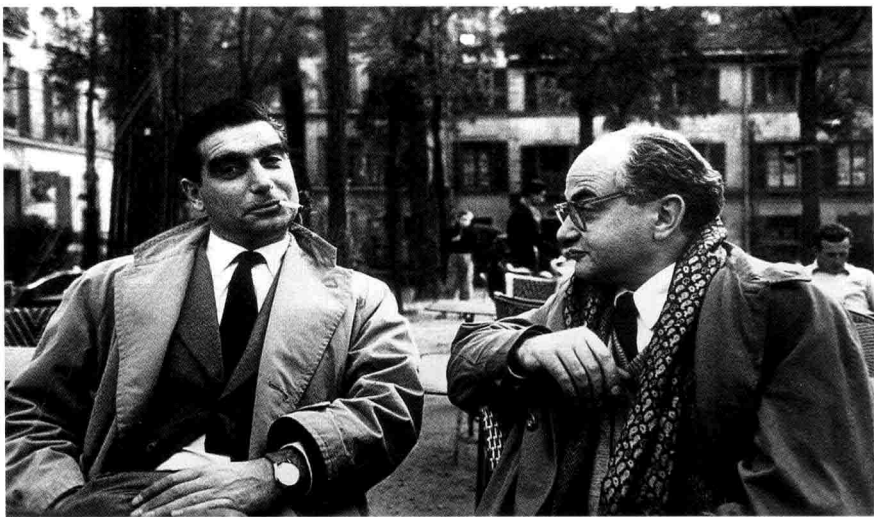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这次进入巴黎是专为我而来的。在我搭乘的美制坦克上，与曾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西班牙共和党人们一起，回到巴黎——那座让我学会品味美食、品尝美酒、坠入爱河的美丽城市……”

“我们的第一站是蒙帕纳斯圆顶咖啡馆前。我最喜欢的那张桌子是空的。穿着浅色印花裙的姑娘们爬上了坦克，我们的脸上很快就满是仿真口红的印记。在众议院附近，我们还得继续战斗，有些口红随即被鲜血洗掉了。深夜，巴黎解放了。”

在卡帕后来的生活里，巴黎是他的总部，是他周游世界的行动基地。就是在巴黎，1945年6月，卡帕认识了英格丽·褒曼并相爱。康奈尔·卡帕记得他哥哥在母亲家的厨房里说，他有个大秘密，还让他们保证，要“守口如瓶”，不可走露半点风声。然后他才宣布他正



1951年，德国埃森。卡帕。



20世纪50年代初，巴黎。卡帕和大卫·西摩（“希姆”）。

在同这位女演员恋爱。

1946年在追求褒曼的时候，卡帕在好莱坞停留了数月，立志成为一名导演兼制片人，同时也在写作《轻微失焦》，他希望以此为基础撰写电影剧本。在《美人计》片场，卡帕拍了许多英格丽的照片，导演这部电影的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他也是褒曼倾诉心事的对象。后来褒曼在回忆录中透露她曾想嫁给卡帕。但格尔达·塔罗的死却让卡帕觉得自己永远不能娶任何人——连英格丽·褒曼也不能。他相信如果他结了婚，就不能再轻易地接受危险的任务了。

在好莱坞的几个月，卡帕对电影事业的梦想几乎完全破灭，尽管在离开好莱坞前，在电影《诱惑》中小试身手，饰演了一个名叫哈马扎的埃及佣人。这部电影由他的朋友查尔斯·科尔文主演。之后，卡帕又试着导演了一部纪录片（1946年底他花了2个月在土耳其拍摄这个项目），但他并没有特别享受这个经历，而结果也差强人意。最终他还是不肯屈服，坚持为他的朋友约翰·休斯顿和霍华德·霍克斯等人的电影拍摄了专题图片报道，并将其提供给《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

1947年卡帕和他的朋友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大卫·西摩（“希姆”）、乔治·罗杰和威廉·范迪维特等人，合作成立了图片社“马格南”。卡帕十几年来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这是他出于对其他图片社的不满，而采取的解决方案之一。在以后的生活中，卡帕投入了大量时间，指导运作在巴黎和纽约的马格南办公室。他最大的

爱好就是邀请年轻摄影师加入到图片社，并将他们看作自己家庭的延伸。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个人和事业，只要条件允许，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努力为他们争取拍摄任务、鼓励他们、借钱给他们，还带他们出去吃饭和参加聚会，甚至建议他们“喜欢别人，并让他们知道”，当然，这也是卡帕自己带头做到的。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巴黎，卡帕过着富有魅力的生活，下午去赛马场，晚上带着美女到夜总会，整晚打扑克。他的好友圈还包括了约翰·休斯顿、舞蹈家兼影星吉恩·凯利以及美国专栏作家阿特·布赫瓦尔德。但是在战后他所尝试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自己的写作才能带给他最大的满足感。他为《假日》杂志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关于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在诸如多维尔与比亚里茨等度假地聚会和赌博，以及从挪威到匈牙利等国家的旅游和冒险。他很喜欢他的文章题注：“文：罗伯特·卡帕，图：作者提供”。

1943年，那不勒斯。卡帕和乔治·罗杰。



20世纪40年代末，卡帕还和几个作家朋友合作过若干个项目。1947年，与约翰·斯坦贝克一起对前苏联进行了约1个月的访问，他们合作出版的书里并置了斯坦贝克的文章和卡帕的图片。第二年卡帕与知名记者西奥多·H·怀特（又译：白修德）一同访问了匈牙利、波兰和前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与小说家欧文·肖出版了一部名为《以色列报道》的书。

20世纪50年代初，卡帕因经营马格南有方，享受着都市生活，做着旅游专题，还为约翰·休斯顿的《战胜恶魔》和吉恩·凯利的《邀舞》等电影拍摄海报。但所有这一切在1953年突然被打断了。因为误怀疑卡帕为共产党人，美国方面吊销了他的护照。（尽管大多时间都住在巴黎，他仍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卡帕被困在巴黎几个月，无法旅行和工作。那年年底，他因背痛在伦敦接受了住院治疗。

在他最爱的瑞士滑雪胜地克洛斯特斯享受了2个半月的疗养假期之后，卡帕急切地想重新工作，尤其为即将展开的日本之行而感到兴奋。《每日新闻》报社邀请他于1954年4-5月之间在日本停留6个星期，为一本新的相机杂志拍摄。但这次旅行还是像命中注定一样在4月底被打断了，因为那时，连续几个月采访法国与越南之间战争的《生活》杂志摄影师霍华德·索丘雷克必须返回美国。在寻找替代者的过程中，《生活》杂志发电报给卡帕，出价2000美元派他前往越南进行30天的报道，另外支付他在东京的开销和25000美元的伦敦莱斯公司的保险单。还没得到回音，编辑就允许索丘雷克启程回国，但要求他途径东京与卡帕交接。

1947年，卡帕和约翰·斯坦贝克从斯德哥尔摩出发去莫斯科前。



两位摄影师一起吃了晚饭并聊到了深夜，但后来索丘雷克回忆说卡帕看起来很游离。好几次他都质疑了这次越南之行的价值所在，并对是否承接这次任务拿不定主意。当他们分开时，索丘雷克说卡帕仍然没有



20世纪50年代，纽约。在菲利普·哈斯曼家打扑克。从左至右：不知姓名的妇女、伊冯娜·哈斯曼（站立者）、基恩·米利、德米特里·凯赛尔、卡帕、佩皮·马蒂斯和康奈尔·卡帕。

下定决心。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卡帕需要钱。《生活》杂志的出价远不算大方，但这足以支付他前一年的律师费和医院账单，而那2000美元只是基础的保证金。如果局势变得严重，他就得采访战争，报酬就会好些，还会因为《生活》杂志发表的所有照片得到稿酬。最后他在与《每日新闻》的合同上，简要地表述为如果有日本境外的任何任务，他可以随时离开，只要他最终还将回来完成为期6周的拍摄约定。

5月2日，星期天，卡帕飞到了曼谷，在那里他必须等好几天签证。终于在5月9日左右，越盟刚刚夺取奠边府的时候，卡帕到达河内。“我刚到河内。”他给马格南巴黎办公室的信里写道，“还没来得及摸相机，故事就结束了。”但是，他其实还没有错过奠边府的战况，因为越盟宣布他们允许法国军队撤离几千名俘虏中的750来名



1954年，日本。卡帕。

伤员。卡帕和《生活》杂志记者多恩·威尔逊立即出发向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进发，采访这次行动。

在河内停留了几天之后，卡帕和《时代》通讯员约翰·梅克林与魁梧的法国集团军司令勒内·科尼将军一起飞到越南北部的南定，将军此去是为了视察外籍军团并颁发奖章鼓舞自奠边府失守以来低落的士气。午餐期间，卡帕和梅克林接

受了区指挥官让·拉卡佩勒中校的邀请，第二天一同前往采访撤离行动，以及铲除向东20英里处兑街和清尼两个小型据点的任务。

第二天，5月25日早晨7点，一辆吉普车停在现代饭店外迎接卡

帕、梅克林以及受邀同行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通讯员吉姆·卢卡斯。卡帕的装备不仅包括装了黑白胶卷的康泰克斯相机和装有彩色胶卷的尼康相机，还有一把装了干邑的酒壶和一把装满冰茶的保温水壶。

一天中，排成纵列的士兵和记者不时被地雷和狙击手阻止前行。在一次停歇时，也就是下午2点50分，卡帕拍摄了在高草间行进的一个排。这张几乎和另一张彩色照片一模一样的黑白照片是卡帕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后来，他到了一个平缓的长满草的堤坝斜坡，在开始往上爬的时候，不幸踩中了越盟的地雷。他的康泰克斯相机缠在左手上，但尼康相机被炸到了几英尺之外。重伤后的卡帕被抬回到5公里以外的东贵村，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了这位摄影家的死亡。

多亏他的朋友，一名教友派信徒约翰·莫里斯的介入，卡帕被葬在纽约约克镇附近阿默沃克的教友派公墓。在会议厅里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爱德华·斯泰肯站起来评价卡帕：“他懂得生活。他体验

20世纪50年代初，巴黎。卡帕在隆尚赛马场。





1954年5月，老挝琅勃拉邦。卡帕和法国军官。

着生活的精华，以不惜一切的精神回报了生活……（他）英勇地、旺盛地生活过，带着罕有的气节。”欧内斯特·海明威（可能从马德里）在来信中写道：“卡帕，他是一个好朋友，一个伟大而勇敢的摄影师。灾难降临在他身上，这也是每个人的不幸。对于卡帕来说尤其不幸。他的形象依然鲜活，以至于想到他已死去时，是如此艰难而漫长。”

约翰·斯坦贝克如此描述

他的朋友：“卡帕知道去寻找什

么，也知道如何应对。比如说，你很难拍摄战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情感。但卡帕却通过其他的影像，捕捉到了这份情感。他可以从一个儿童的脸上表现一个人所有的恐惧。他的相机捕捉并且保存了感情。他照片的成功绝非偶然，当中对情感的捕捉也绝非运气。他可以拍摄情感、欢乐和心碎的瞬间，也可以拍摄艰难的时刻。卡帕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颗伟大的心和压倒一切的悲悯。没人能

1953年，卡帕、伯尔·艾夫斯和约翰·休斯顿在伦敦临床医院。



1941年，爱达荷州森瓦利。卡帕和欧内斯特·海明威。

取代他。没有人能代替这位优秀的艺术家，但我们很幸运地在他的照片里看到了他可贵的品质。”

罗伯特·卡帕一直自认为是一名摄影记者，而不是一名艺术家。但他有着真正艺术家的精神，他以极大的智力、热情、技巧、敏感、智慧和优雅创作作品。在一篇题为《何为艺术》的文章里，列夫·托尔斯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艺术是一种人类行为，它在于一个人有意识地通过某种标识，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他通过使别人感受到这些情感并体验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定义，那么谁能够否认罗伯特·卡帕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呢？

通过电视看新闻的人不需要看卡帕的照片来提醒自己这个世界可能变得多么可怕和暴力。卡帕的作品最宝贵之处在于向我们展示了诸多人类精神战胜逆境和邪恶的瞬间。他用最有力的视觉雄辩提醒我们，普通人的坚韧、仁慈和乐观是对抗黑暗力量最有力、最具英雄气概的方式。